

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滔天罪行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成员 吴冬梅

(一)

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这两件特大喜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生前安排的接班人。华主席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华主席具有高尚的品质、卓越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贴心人。我们热烈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热烈欢呼人民军队又有了自己的最高统帅。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他们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猖狂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大搞阴谋诡计，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的路线。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次市委召开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们参加这次会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二)

长期以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拚命抓枪杆子。他们反军乱军,妄图篡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权。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破坏民兵建设,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自成体系,另搞一套,梦想把上海民兵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次,他们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和狰狞面目。

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同历来的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的头子一样,错误地估计形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在“四人帮”的授意下,上海市委中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加速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加紧装备上海民兵。六月下旬,王秀珍急急忙忙要民兵指挥部立即起草发放武器的报告。指挥部根据“用旧存新”的原则,在报告中提出把两万余枝新的全自动步枪入库。马天水却于七月三日要指挥部全部下发,不必入库。并说,不要再写报告,发了以后写个情况简报就行了。八月初,马天水得知这批武器还没有下发,就大发雷霆,要“立即下发”,“明天就下发”。就这样,从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共发了步枪七万三千多枝,机枪二百挺,八二迫击炮三百门。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从凌晨三时到二十三时,仅二十个小时,就发出了各种子弹六百余万发,炮弹一万五千多发。

十月六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从而极大地震惊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十月七日,马天水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又与“四人帮”联系中断,急得他们千方百计刺探情况。十月八日上午,凭他们的反革命政治嗅觉,根据种种迹象,认定“四人帮”被扣了。他们预感末日来临,好象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要作困兽之斗。经过密谋策划,决定用反革命两手,抓舆论、抓武装,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公然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十月八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急急忙忙找警备区李彬山、张宜爱,民兵指挥部施尚英等人 and 公安局的某些领导人,到市委交待“任务”。徐景贤、王秀珍疯狂地叫嚷:“中央出修正主义了”,“可能宫廷政变了”,“把三个领导扣起来了”,“把马老也软禁起来了”。煽动大家,“你们要加强战备”,“要准备干”。王少庸详细地查问了民兵战备情况,武器、弹药数字。当他们知道民兵手中弹药很少,就进一步问:仓库在哪里?施尚英说:“在警备区。”王少庸又问:“打起仗来,能拿得出吗?”施尚英说:“靠不住,但还有路子,有两个工厂库存大约有八百万发。”王秀珍连忙说:“你们现在就要抓紧准备”,“要准备独立作战”。

当天晚上十时，施尚英等人，在李彬山的家里，秘密策划，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他们具体研究了第一批、第二批应急力量，要求人车配套，枪弹配套，研究了指挥点的设置和人员选择，通讯联络手段，还规定了联络暗号。

八日深夜，徐景贤带了王少庸、张宜爱等人，在华山路一个招待所继续密谋。王秀珍带了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王明龙、马振龙、汪湘君、廖祖康等，以及警备区的李彬山、杨新亚，窜到民兵指挥部，对施尚英等人面授机宜，要民兵指挥部立即部署兵力。王秀珍亲自带来徐景贤的手令，内容是：“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廖祖康还要施尚英等人赶快拿出地图，研究叛乱部署。王秀珍鬼鬼祟祟，再三交待：“我们的指挥点在东湖路。”“你们指挥部目标太大，要另外选两个指挥点。”他们还妄图动用部队。当冯国柱打听部队情况时，杨新亚出谋献策，一一交了底。当廖祖康问杨新亚、李彬山：“如果马老北京开会不回来，周司令回来请你开会，然后把你们抓起来怎么办？”李彬山恶狠狠地说：“不见马老回来，我不参加会。”

九日凌晨二时，施尚英等人确定了基本指挥点和预备指挥点。同时，要求兵力相对集中，领导成员作了分工，向各区派出联络员，确定了三个重点区。

十月九日上午，施尚英等按照徐、王的旨意，召开了十个区、五个民兵师的“紧急会议”，谎称“加强战备”，对反革命武装叛乱作了具体部署。为了蒙蔽群众，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在会上大耍花招，说：“这次战备，部队与民兵各不相干，互不搭界，部队归部队，民保管民兵”。会后，施尚英等人佩带手枪、匕首，杀气腾腾地带着指挥点的人员和指挥器材，钻进了黑据点。在点上，他们立即架设电台，与各区沟通联络，动用电台多达数十部。

十月十日，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行前特别交待叶昌明召集总工会常委“分析形势”，窥测方向。叶昌明等上窜下跳，在工人文化宫、东湖招待所等处秘密活动，从各个方面加紧策划，黄金海还从物质保障方面作准备。他们熬红了眼，一心想“干”。市公安局某个领导人也叫嚣“公安‘战备’有准备”，还拿出小本子给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看，上面写着：机动民警一千多人，短枪九百多枝。

十日、十一日，他们在秘密指挥点上，进行了频繁的活动，时而对下发报，沟通联络，时而外出检查所谓“战备”，继续造反革命舆论。

到十二日，反革命武装叛乱阴谋活动达到了顶峰。那天晚上，在市委常委学习室，到会的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马振龙、朱永嘉、王日初、王知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等人，已确切知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后，他们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要破釜沉舟，垂死挣扎。朱永嘉站起来歇斯底里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马上干！要在六点钟之前实施完毕。民兵要进驻电台。电台在六点钟

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全世界人民书》。我们的口号就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姚文元’，‘还我王洪文’。报纸同时印发，马路上要拉出横幅。接着组织工人上街游行，这样一来，上海马上会乱。只要坚持一个星期，迫使他们把四人放出来。”王知常也跳出来：“现在就是要大干。这个事，八号搞就成功了，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否则等着一个一个被收拾。”参加这个反革命黑会的都绝望挣扎，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干”。最后冯国柱凶相毕露地说：“现在各路各方面积极准备好干，行动一定要统一，等他们三个领导（马、徐、王）回来后，再统一行动。”马振龙还组织起草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口号二十条，狂叫什么“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致敬”等等，真是反动透顶！

就在这个反革命黑会期间，施尚英急急忙忙地打电话给基本指挥点，要他们进一步拟制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作战计划。于是，“捍一”、“方二”的作战计划就出笼了。他们设置了三个控制圈，对付江苏、浙江方向的六个控制点，提出了十大桥梁、过江隧道以及机场、车站、码头、电台、报社等所谓重点目标的“保卫方案”，具体部署了兵力，规定了标记、暗号，编制了口令、暗令。使尽了反革命的伎俩，要与无产阶级“决一死战”，枪口完全是对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华主席统帅下的人民解放军。这时，反革命武装叛乱一触即发。

十月十三日上午，施尚英还派人到区里去“吹风”、“稳定军心”。直到十三日下午四时，黄金海、王知常等这些死心塌地的干将，还要把民兵拉出来干。直到十月十四日，他们眼看大势已去，才被迫收起了武装叛乱的摊子。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四人帮”和他们在上海的一伙，表面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骨子里却非常虚弱，人心丧尽，极端孤立。当王秀珍等人窜到民兵指挥部时，心惊胆颤，狼狈不堪。他们警戒森严，楼上楼下布满了岗哨，搞钉梢、监视，完全是法西斯的一套；在秘密指挥点上，他们还准备了仓惶出逃的备用车、船；有的人还演出了“霸王别姬”的丑剧。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军民面前，这一小撮跳梁小丑，只能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三）

非常明显，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绝不是偶然的，是“四人帮”蓄谋已久的。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对王、张、江、姚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

动。他们早就预谋利用武装，进行反革命叛乱。不仅从舆论上，而且从组织上、物质上作了大量的准备。

一、大造反革命舆论，蛊惑人心。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新生事物的积极支持者”。他们把在上海民兵和民兵指挥部中搞的一套，一概自封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言下之意，只有照他们那样去做，才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则，就给你扣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新生事物”的大帽子。一九七三年七月，“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由王洪文出面，把重印的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七月写的，关于上海工人要求建立武卫组织的请示，寄给上海市委，既不编号，又不发其它省、市，并附了一封黑信，胡说“对待文攻武卫这个问题”，“是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是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实际上是存在着斗争”。还指令要市委、警备区、市民兵指挥部“认真讨论”，并要把讨论情况告诉王、张、姚！从这时起，“民兵改造”论，“民兵万能”论，“民兵独立”论纷纷出笼。他们还要上海民兵进行所谓“文攻武卫”的传统教育，要文艺出版单位写民兵题材的小说，演民兵题材的戏，拍民兵题材的电影，要报社、电台连篇累牍地宣扬他们的所谓“新鲜经验”，甚至要全国各省、市来上海“取经”！

早在一九六八年，王洪文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把我们这支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并规定调动一个排、一个连，都要经过王洪文等人同意，“如果要调动一个营的话，要请示张春桥”。去年九月十八日，王洪文更加赤裸裸地说：“上海民兵是春桥和我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把他们自己打扮成上海民兵的创始人！显而易见，这就是他们要篡夺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权，就是要枪指挥党，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二、在组织上，另立系统，搞第二支武装。“四人帮”早就野心勃勃，阴谋篡夺军权。江青胡说什么：“部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啊？”“等部队搞好了，问题解决了，我再穿上军装，再戴上红星。”王洪文同样恶毒地说：“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于是，他们就拚命要在军队里安插他们的人。在警备区，他们以极为卑鄙的手段，打击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分裂军队，培植亲信。马、徐、王在军队里没有职务，却根据“四人帮”的旨意，到处插手。王秀珍甚至当着警备区部分机关干部的面，指着张宜爱、李彬山说：“这就是你们的司令、政委。”一语道破了天机。但这只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与此同时，他们极力拉起第二支武装。王洪文多次说过，建立民兵指挥部“不是一个随便什么形式的问题，而是根据整个战略来改变和确定形式。”很显然，他所说的“战略”，就是要篡党夺权。出于这个险恶的用心，他们极力反对警备区和区、县人武部来负责民兵

的日常工作,污蔑上海警备区管民兵工作是“二元论”,“军事一条线”,逼着警备区把掌管的民兵组织、民兵经费和民兵的武器装备,都要交出;这还不算,还要警备区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稍不顺心,就扣上“路线不正”、“不支持新生事物”等等罪名。他们甚至要成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疯狂破坏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一九七五年初,周宏宝去教育部工作时说:去北京是有思想准备的,是准备去搞民兵总指挥部工作的!可见,“四人帮”早就阴谋要成立一个全国民兵总指挥部了。

去年九月,王洪文窜来上海,更加疯狂地从组织上加紧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准备。他对马、徐、王和市指挥部的头头露骨地说:“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作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能站得住”,“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二十年后我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与毛主席、党中央对抗到底的顽固立场。在这次谈话后,王洪文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不经中央军委同意,也不报告毛主席,就私自下令在上海搞区、县人武部和指挥部“两部合并”的试点。试点刚开始,上海市委马天水等人,秉承王洪文的旨意,迫不及待地以市委名义拿出所谓“试点”的经验来,阴谋推广到其他地区,以便砍掉所有的人民武装部。

市民兵指挥部坏人掌了权。他们结党营私,以帮划线,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干了许多分裂的勾当。利用各种形式,来操纵、控制民兵组织,进而达到控制整个上海民兵的目的,妄图把上海民兵引到邪路上去。

三、加紧军事训练,积极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物质准备。这几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再叫嚷要讨论上海民兵的“战备方案”,喋喋不休地要上海民兵加紧军事训练。去年九月,王洪文在上海,从上到下,到处鼓吹“加强战备观念”,要民兵搞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等战术训练,包括搞“城市巷战”,要民兵干部“学会指挥”等等。还亲自带了市、区指挥部等一些头头去打靶,接见照相。徐景贤当场进一步加以鼓吹,说什么“王×××带领我们学军事”。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王洪文是代表“四人帮”来上海“打招呼”、“发信号”,要他的干将们准备动手篡党夺权。

“四人帮”还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要给上海民兵装备几十万件武器。他们搞的上海民兵武器装备“十年规划”第一年即一九七五年,武器累计已达“十年规划”的百分之四十四。他们还在上海擅自搞了一些军火工厂,造枪、造炮,每年生产全自动、半自动步枪一万多枝,三年来化去三千二百多万元。他们造了“微型冲锋枪”,还要造所谓打“巷战”、“地道战”的自动步枪、“打火机手枪”。他们为了拚命装备上海民兵,不惜一切代价,从各个方面加快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帮”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早就预演过了。就是在毛主席多次斥责“四人帮”的一九七四年，他们搞“三箭齐发”，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一方面借批林批孔的机会，在幕后指挥一些人，搞乱军队；另一方面，在四、五月间，他们突然搞了一次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的所谓“战备”，实际上，这已经是一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预演。

大量事实说明，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上海市委的一些领导人阴谋策划的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四人帮”蓄谋已久的，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长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四)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教导我们：“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四人帮”及上海市委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预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只能是痴心妄想。上海军民、上海民兵早就有所察觉，有所警惕，有所抵制。不少单位抵制得很有力。例如，当他们在—个工厂设置反革命武装叛乱指挥点时，这个厂的党委和民兵，不但对他们保持警惕，机智地拍摄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现场照片，而且真正加强了革命人民的戒备。如果 they 要动手，就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最坚定地站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边的。“四人帮”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经揭露，广大民兵义愤填膺，象火山爆发似地起来造他们的反，纷纷揭发、声讨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多年的苦心经营，顷刻瓦解，—朝覆亡。

我们上海民兵，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指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在警备区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我们要—笔—笔地清算；“四人帮”的反动谬论，我们要—个—个地深揭狠批。我们要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办民兵，加强民兵建设，组织民兵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御帝国主义侵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战斗到底。